

·调查与思考·

教育公平与户籍身份

——基于上海市中小学生的调查

严善平 周海旺

【摘要】文章利用2012年上海市中小学生基本情况调查的微观数据,对中小学生的学力分布、学力差异和学力的形成机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上海本地学生的学力水平明显高于外地学生,但户籍本身并不是学力差距产生的直接原因。外地学生之所以学力较差,主要是因为其父亲的学历较低、随父母流动误学较多、家庭条件差、自学时间不足、现有高中升学和高考制度对外地学生的负面影响等。要改变目前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必须进一步改革相关政策和制度,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教育公平 偏差值 户籍 家庭背景

【作者】严善平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周海旺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上海市实行流入地为主、公办学校为主,以及对城市孩子和农民工子弟一视同仁的政策(简称“两个为主、一视同仁”),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在当地的公办中小学就学,与当地学生使用一样的教材、上同样的课。在此背景下,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的研究也突破了过去的框架,把视野从农民工子弟扩展到公办学校的全体学生,强化了农民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比较研究。例如,熊易寒(2010)通过深入访谈上海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详细描绘了公办中小学内部的二元结构,指出了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与现行高中升学、大学考试等制度的内在关联。但是,在大城市的公办中小学中,流动儿童与当地孩子在学习成绩方面到底有没有差距?这个差距有多大?又是怎么产生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还不多,在定量把握问题的所在和内在机制方面,文献更少。本文利用上海市中小学生问卷调查数据,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本地与外地学生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的理解。

二、上海市的农民工子弟教育

(一) 调查基本情况

本文所用的数据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于2012年2月在上海市中心的静安区、近郊的嘉定区和远郊的青浦区6所公办中小学进行的调查，共得到1317个有效样本。调查项目主要有学生本人的个体特征、就学转学情况、对未来的学历和职业志向、各科目的期末考试成绩、父母及家庭的基本特征等。我们利用学生本人是否在上海出生和父母的出生地等信息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分类(见表1)。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把父母及本人均为外地出生的作为外地学生，其他的均视为上海学生。

(二) 公办

学校里的学生构成

从表2可以看出，各区、各年级、每个班的学生数各异，但相差不大

，每个班级人数30人左右；学校所处的位置不同，外地学生的比例相差甚远。市中心的静安区不到20%，而远郊的青浦区达80%左右。总体水平为在校学生的近半数，小学阶段和初一的学生中，该比例更高，到了初二、初三，外地学生的比例则急剧下降。外地学生初中毕业后，面临上高中、考大学的选择，而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他们必须回到户籍登记地上高中。

(三) 学生年龄与所在年级的差距

我们依据每个学生的实际年龄和所在年级相应年龄(按6周岁入小学1年级推算)，计算出二者的差距(也可称为误学年限)，再按误学年限看所有学生的分布情况。考虑到入

表1 调查对象的出生地分类

出生地分类	静安区	嘉定区	青浦区	合计	%
	(430人)	(454人)	(433人)	(1317人)	
父母均为上海出生，本人外地出生	1.6	0.4	0.9	1.0	
父母及本人均为上海出生	53.0	22.5	7.2	27.4	
父母一方为外地出生，本人外地或上海出生	20.5	27.3	6.9	18.4	
父母均为外地出生，本人上海出生(部分除外)	7.7	3.3	5.5	5.5	
父母及本人均为外地出生(含部分上海出生)	17.2	46.5	79.4	47.8	

表2 调查对象的所在地区及基本属性

总人数 (人)	调查对象的地区分布(人)			外地学生比例(%)			女生比例(%)				
	静安区	嘉定区	青浦区	静安区	嘉定区	青浦区	全体	外地学生	上海学生	全体	
三年级	195	59	61	75	39.0	47.5	73.3	54.9	45.7	47.1	46.3
四年级	218	55	73	90	12.7	68.5	81.1	59.6	43.8	46.5	44.9
五年级	167	64	72	31	9.4	63.9	77.4	45.5	39.1	50.6	45.6
六年级	198	67	71	60	13.4	56.3	96.7	54.0	40.2	54.5	46.8
七年级	187	60	67	60	16.7	41.8	96.7	51.3	45.8	53.8	49.7
八年级	172	63	49	60	14.3	22.4	81.7	40.1	46.4	55.6	51.8
九年级	180	62	61	57	16.1	11.5	47.4	24.4	45.2	45.8	45.7
合计	1317	430	454	433	17.2	46.5	79.4	47.8	43.7	50.4	4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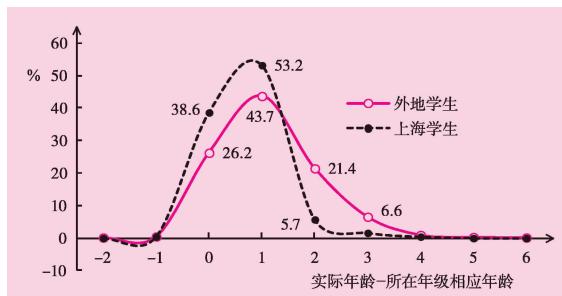


图1 实际年龄与所在年级相应年龄差距的人数分布

比上海学生高 22 个百分点。这其中也有学习成绩不佳导致的留级,但更多的可能是外地学生跟随父母流动,因转学、适应新的学习环境等,而不得不在较低年级学习。如果这个判断正确,我们则必须承认,户籍身份在中小学生的教育机会方面,已经产生了实质上的不公平,有 30% 的外地学生不能和上海学生一样按部就班地入学、升级。

三、学校教育的定量分析

在“两个为主,一视同仁”的新政下,大批农村出生的孩子跟随父母来到上海,进入公办学校,免费享受义务教育,但是,这些孩子将来能否继续深造,进而在上海定居,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市民,除了户籍等因素的制约,还有要看其学力能否达到必要的水平。

(一) 偏差值:衡量相对学力的统计指标

学力泛指学生对学校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主要表现为各种考试的得分多少,其中有单科的考分,也有各门功课的总分,期末考试、高考都是典型的学力测试。如果考生使用同样的考题,各自的得分则可以横向比较。但是,如果若干个年级的学生同时举行考试,而且各自的考题又不一样的话,则难以判定哪些同学的成绩相对较好或较差。为了消除绝对分数难以直接比较的缺陷,本文采用偏差值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个人的偏差值为“ $50 + (\text{自己得分} - \text{样本均值}) \times 10 \div \text{样本的均方差}$ ”,偏差值 50 表明个人的成绩与总体平均一致,大于 50 的则成绩好于总体平均。一般来讲,60 以上的偏差值是十分出色的,可以考上较好的大学。

在同一个群体内部,偏差值可以用来衡量个体之间相对学力的高低,而不同群体之间的偏差值往往没有可比性。但在社会群体中,相对优秀或相对落后的都存在一定的比例,并且这种结构十分稳定。

(二) 从偏差值看上海与外地学生的学力差异

我们分别计算了 3 个区、7 个年级期末考试^①的总分平均值和均方差,再利用各区、各年

学的时期或计算上的误差,可以把误学 1 年或提前 1 年入学的同学排除在外,重点考察误学超过 1 年的比例和误学对成绩的影响。从图 1 可以看出,外地学生误学的比例明显高于上海学生。与年龄相比,上海学生误学 2 年的比例仅为 5.7%,而外地学生则高达 21.4%。如果加上误学 3 年或更多的部分,外地学生的比例为 30%,

^① 三年级至七年级只有语文、数学和英语课,满分均为 100,八年级(初二)增加了物理,九年级增加了化学,各校各科目的满分有所不同。

级的平均值和均方差,计算出每位同学的总分偏差值。由于偏差值反映的是同一个群体内部个人之间的相对学力,所以各学校、各年级的考试科目和各科目的满分数值对偏差值没有影响。

图2是全体调查对象的偏差值与其属性特征交叉汇总的结果,数字表示上海学生和外地学生按偏差值分组的百分比。总体来看,偏差值在60及以上的优秀学生占11.0%,偏差值为50~60的学生占48.6%,两者合计占全体学生的近60%。但是,在上海和外地学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期末考试成绩高于平均值的外地学生相对较少,偏差值60以上的比例大大低于上海学生。相反,偏差值在30~60的比例,外地学生达87.0%,比上海学生的82.1%高出4.9个百分点。

从各年级来看(见图3),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偏差值呈现了不同的倾向。在中小学的4~7年级,外地学生的成绩甚至比上海学生的还好,但到了快要升高中的8、9年级,二者的情况恰好相反。在9年级(初三),上海学生比外地学生高出5点。这一现象与目前的高中升学和大学招生制度有关。外地学生由于没有上海户口,不可能参加当地的高中升学考试,更无法在上海参加高考。他们当中部分学生初中毕业后回老家上高中,部分学生选择在上海上职业学校,还有一些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故此,一些原来成绩不错的学生成绩也逐步下降。

四、学力(偏差值)差异的产生机制

尽管学力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但在升学、就业、晋升等各个环节,书面考试的成绩好坏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终身。对学力形成的内在机制,以及学力差异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加深理解学校教育中的相关问题。下面我们利用微观数据,计量分析中小学生学力差异的产生机制。

(一) 学力的意义与学力的形成机制

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是在先进的西方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义务教育制度并不能保障学力形成过程的实质性的机会均等。学力的形成除了学生自身的潜在能力和努力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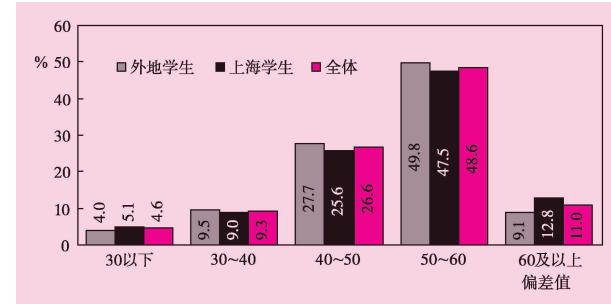


图2 按偏差值看学生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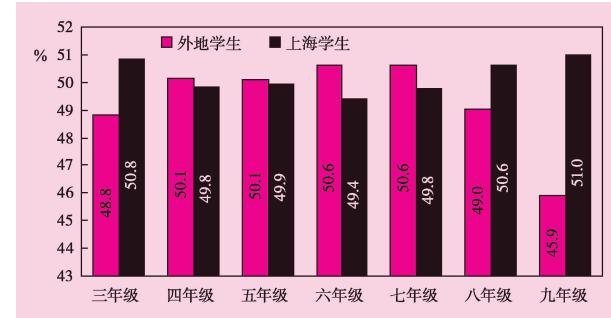


图3 按户籍身份的各个年级偏差值平均

父母的学历、职业和经济地位也十分重要。如果家庭经济富裕,家长可以为孩子聘请家教,进行课外辅导,这就产生了机会不平等现象。

基于上述学力与经济社会地位的相互关系,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重点考察了中小学生的学力形成机制,特别是上海与外地学生差异的起因。理论假说有以下几点。

假说1:总体而言,个人的学力与其努力程度相关,课外的学习时间越多,相对成绩也越好。假说2:学力的高低与本人的学历志向相关,期望的学历(受教育水平)越高,相对成绩越好。假说3:不能按部就班学习对学力形成有负面影响,误学年限越多,学生的相对成绩越差。假说4:个人的学力与其家庭背景相关,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的学力也相对较强。假说5:学力与学生的户籍身份相关。由于外地学生在居住条件、家庭收入等方面与上海学生有较大差距。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外地学生的学力要低于上海学生。假说6:在上海学生中,个人的学力也受各自属性影响。与父母及本人都是上海出生的学生相比,父母一方或双方均为外地出生的学生(不管他本人是否为上海出生),其学力相对较高。因为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在其他地区出生、而现在是上海市户籍的群体,一般都有较高的学历或专业知识,这个特点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子女的学力水平。

(二) 计量分析模型变量设置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我们采用常规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即把学力(偏差值)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把可能影响学力的各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并在模型中加入学年、调查地点等控制变量。在考察模拟结果之前,我们先定量描述主要变量的基本特征(见表3)。从全体调查对象来看,在家学习时间每天平均为2.7小时。但上海和外地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上海学生2.8小时,外地学生2.5小时,并且在两个群体内部,学习时间的不均等程度也不一样,外地学生大大高于上海学生。

从图4可以看出,无论是上海学生还是外地学生,父母的学历与子女的偏差值之间都存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在父母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外来家庭,子女的学力明显较高,而在上海本地家庭中,这种倾向不怎么显著。在这次调查中,上海学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2.7年、12.3年,大专或大学的比例分别为44.7%、42.9%,而外地学生的父母仅有9.9年、9.3年,大专或大学的比例仅为7.5%、6.9%。可见,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拥有明显不同的家庭背景,上海学生大大优越于外地学生。

同时,学生的学力高低与自身的努力程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外地学生。如图5所示,在父母为非大专大学水平的学生中,无论是上海学生还是外地学生,随着在家学习时间的增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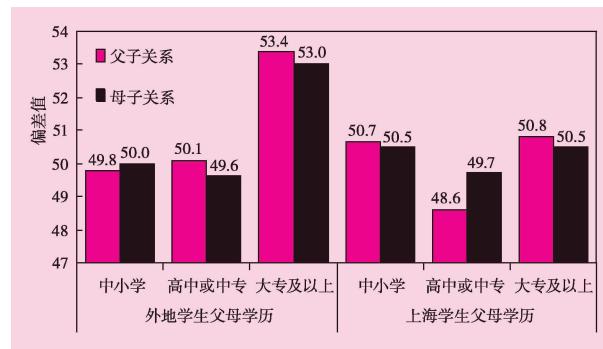


图4 父母的学历与子女的成绩

表3 学力的决定因素(OLS 回归)

	基本统计量(%)	全体样本① 回归系数	全体样本② 回归系数	外地学生 回归系数	上海学生 回归系数
常数		43.722***	42.946***	39.294***	45.988***
女生(男生为0)	47.3	2.727***	2.745***	2.807***	2.831***
每天在家学习时间	2.7	0.091	0.106	0.498*	-0.462
将来想学到硕士或博士	35.7	3.940***	3.897***	3.016***	4.216***
误学年限	0.9	-1.185***	-1.154***	-0.679*	-1.770***
父亲受教育年限	11.4	0.234*	0.224+	0.280+	0.145
母亲受教育年限	10.9	0.044	0.077	0.219	-0.032
上海学生(外地学生为0)	52.2	-0.613			
父母及本人均为上海出生	27.4		-1.165		
父母一方外地出生,本人外地或上海出生	18.4		-0.314		1.011
父母均为外地出生,本人上海出生 (父母一方或双方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5.4		0.449		0.347+
父母均为上海出生,本人外地出生	1.0		-2.770		-2.530
三年级	14.8	-0.268	-0.403	-0.455	0.147
四年级	16.5	0.299	0.293	0.396	0.398
六年级(初中预备班)	15.0	-0.151	-0.200	-0.054	0.436
七年级(初一)	14.2	0.596	0.562	1.695	0.333
八年级(初二)	13.2	0.332	0.362	0.108	1.735
九年级(初三)	13.7	0.707	0.763	-1.695	2.412+
嘉定	34.4	3.193***	3.122***	5.128***	0.706***
青浦	32.8	3.924***	3.825***	3.509***	5.779***
调整后的决定系数(R^2)		0.061	0.061	0.079	0.078
样本量		1175	1175	542	632

注:(1)虚拟变量中,上海学生以父母及本人均为上海出生(27.4%)、学年以五年级(12.6%)、调查地以静安区(32.8%)作为参照系。(2)***、**、*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显著。

力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在父母为大专或大学水平的学生中,上海学生的平均学力较低,并且与在家的学习时间没有明显关系;而外地学生的情况截然不同。随着每天在家学习时间的增多,其学力呈显著增强趋势。外来学生的努力与否对学力高低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将来想学到什么文化程度的回答结果中,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之间也有显著差异。前者有 43% 回答期望读到硕士或博士,而外地学生仅有 28%。为了更具体地考察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对学历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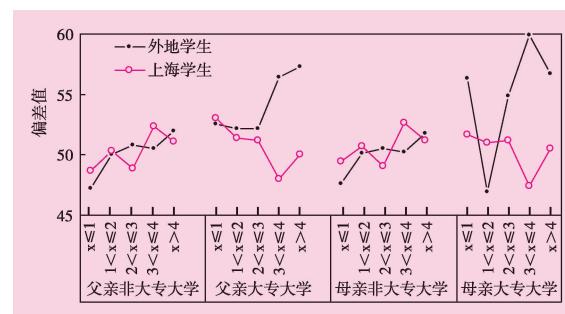


图5 父母的教育水平、学生的努力程度与学力的关系

的差异,我们从调查对象中抽取了偏差值 50 及以上的两个组,考察这些成绩优秀的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在学历志向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偏差值 60 及以上的外地学生期望读到大专或大学、博士学历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高出 3.9 和 7.0 个百分点),而偏差值为 50~60 的外地学生期望读到硕士、博士学历的比例均大大地低于上海学生(相差 8.1 和 6.1 个百分点),对未来能读到什么程度都说不清楚的外地学生比例为 27.7%,比上海学生高 10.3%。从这些数字可以推断,户籍身份显著影响学生的学历志向,学习成绩优秀的上海学生不仅对自身的学历志向目标明确,希望达到的学历层次也相对较高,而外地学生的学历目标相对较低,没有明确目标的学生比例较高。简言之,户籍身份影响学生的学历志向,进而有可能影响学生的学力提高。

(三) 学力差异的形成机制

表 3 给出了学力决定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其中包含了以全体样本为对象的两个模拟方程和外地学生、上海学生模拟方程。从调整后的决定系数看,4 个模拟方程的解释能力为 6%~8%。根据各个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水平和回归系数,可以对各因素与学力的关系进行解释。

首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如果仅从学生是上海还是外地来看,二者之间的学力差异不显著。但是,进一步考察上海学生内部的属性特征,则可以发现,父母一方或双方均为外地出生的家庭,其子女的学力(偏差值)要比父母及本人均为上海出生的学生稍高一些。父母均为上海出生,本人外地出生的学生,其学力与父母及本人均为上海出生的学生均没有显著差异。这个结果否定了本文的假说 5,支持了假说 6。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统计事实,说明城乡一体化战略在学校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因为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外地孩子,不会由于自己的户籍身份在学力竞争方面落后于上海同学。由此可以推断,户籍身份已经不是造成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学力差异的主要原因,初等义务教育的机会平等已基本实现。当然,这还是一个暂时的判断,是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的结果。

其次,从误学对学力的影响(假设 3)看,该变量在所有的模拟方程里都表现了较强的统计显著性,回归系数为负值,意味着误学不利于学力提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误学 1 年,期考总分的偏差值下降 1.2。结合图 3 所显示的统计结果可以大致推断,外地学生的学力相对较低可能与他们的大面积误学有关,因为 30% 的外地学生误学 2 年及以上。

第三,学生对未来的学历期望越高,其目前的相对学力水平越高(假说 2)。在 4 个模拟方程中,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具体地说,将来期望读到硕士或博士的孩子,其总分偏差值比其他孩子高出 3.9 点;与外地学生的 3.0 相比,上海学生的效果更为显著,达 4.2。学生本人的主观意识对学力形成的影响十分明显。当然,二者之间不一定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可能是较强的相关关系。但如果因为个人属性的不同,上海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从一开始就对未来的学历抱有不同的目标,而且这又起因于户籍身份的话,事情就要变得较为复杂。

第四,家庭背景对子女学力的影响,如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等(假说4)。由于数据的制约,表3中只有教育1个变量。从表3可以看出,母亲学历的高低对子女成绩好坏没有显著影响,上海学生、外地学生都是如此。父亲受教育水平呈现出一定的统计显著性,外地学生中的这一倾向更为明显。在上海学生的模拟方程中,这一关系没有得到统计支持^①。表3的结果还显示,每天在家学习的时间越多,学力相应较强,但在上海学生中,这种关系不十分显著。女生的学习成绩普遍比男生好,上海学生更为突出。与静安区的学生相比,嘉定区、青浦区的学生偏差值要高出3个点。这表明,同为上海市的公办学校,各校学生都接受法定的初等义务教育,但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学力差距。

五、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2012年上海市中小学生基本情况调查的微观数据,对中小学生的学力分布、学力差异和学力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上海本地学生的学力水平明显高于外地学生,但户籍本身并不是学力差距产生的直接原因。外地学生之所以学力较差,主要是由于其父亲的学历较低、随父母流动误学较多、家庭条件差自学时间不足、现有高中升学和高考制度对外地学生的负面影响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上海市尽管普遍实行了“两个为主,一视同仁”的农民工子弟教育政策,但流动的特点和户籍身份对外地学生的学力形成依然有不利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实质上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外地学生因随父母流动而误学,高中升学、大学招生制度降低了外地学生的学历志向,较差的家庭居住条件制约了外地学生的自学时间,所有这些因素都拉大了外地学生与上海学生之间的学力差距。要改变目前这种实质上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需要尽可能消除伴随流动产生的误学,加快高中、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同时,要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条件,为孩子们提供较好的家庭学习环境,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廖大海(2004):《上海地区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报告》,《上海教育科研》,第12期。
2. 刘精明(2008):《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3. 田慧生、吴霓主编(2010):《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基于12城市调研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
4. 熊易寒(2010):《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第1期。

(责任编辑:朱犁)

^① 我们进一步把父母的教育水平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或大学,并以虚拟变量的方式代入学力模拟方程,以测试父母教育与子女成绩的关系,其结果与教育年限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